

DONGHU·RENWEN

# 江村消夏品书画

## ——高士奇《江村消夏录》

■ 季小英

高士奇是清康熙帝的文学侍从，在文学、史学、政典、书法、鉴赏等方面都颇有造诣。在晚年官场上的政治斗争中，他选择急流勇退，并未回到自己的故乡杭州，而是把离杭州不远的平湖作为归隐之地，并在此期间在书画鉴藏方面成就了《江村消夏录》一书，成为让后人推崇的书画著录体著作的集大成者。

高士奇(1645—1703)，字澹人，号瓶庐，又号江村。祖居余姚(今慈溪市樟树村)，以钱塘籍补杭州府学生员，晚年定居平湖。清康熙十年(1671)入国子监，试后留翰林院办事，供奉内廷，为康熙帝所宠信。康熙十四年，授职詹事府詹事，不久升内阁中书。康熙十八年后，历任翰林院侍讲、侍读、侍读学士、《一统志》副总裁官、詹事府少詹。康熙二十八年，随帝南巡。因与明珠一派争权夺利，被左都御史郭琇弹劾，解职归里。康熙三十三年，奉召入京，起补原职，充《明史》纂修官。康熙三十五年，三次随康熙帝西征新疆，磨盾草檄，皆倚马立就。康熙三十六年，以养母求归，康熙帝在畅春园召见，亲赐金卮酒，特授詹事府詹事。康熙四十一年，升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加正一品，以母老未赴。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卒于家，赐祭葬，溢文恪，葬于县城南郊。高士奇平生学识渊博，书法善钟王小楷，工诗，尤长应制体，论者及桐城张英并称。精鉴赏，凡法书名绘摹鼎彝拂拭者，声价十倍。藏书画甚富。著有《毛诗讲义》《左传纪事本末》《扈从东巡日记》《北墅抱瓮录》《柘西闲居录》等。

清康熙年间，文人官僚都好书画收藏，他们通过雅集品艺的鉴赏方式，营造了浓郁的

艺术氛围。此时，进入仕途的高士奇结交了不少有艺术修养的满汉贵族、官僚，并有机会多次观看内府收藏，眼界大开。康熙十六年(1677)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刚刚进入南书房任内阁中书的高士奇在《随辇集》卷一《天府宝翰册》中，记录其在内府看到的历代法帖十六卷——

赐观内府所藏，王羲之、怀素、颜真卿、蔡襄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朱熹、赵孟頫、董其昌真迹共十六卷，初拓淳化帖，全部皆希代之珍也。

纵观高士奇的鉴藏轨迹，从16岁就开始书画收藏活动，30岁之后随着政治地位的抬升、眼界的开阔和财富的增加，收藏活动逐渐进入高潮，并且持续到去世。高士奇的藏品，主要来源还是通过与文人、士大夫、官僚及其他书画鉴赏家或赠或买的来往交流，而解职归田之前的在京岁月是高士奇扩充收藏的高峰期。

康熙二十八年(1689)，高士奇解职归里，遂定居平湖。高士奇为何选择平湖为定居地？他在康熙二十九年所撰的《重修平湖报本塔记》中有这样的讲述——

闻平湖风俗敦朴，欲家焉……常寓书同年陆编修雅坪为买宅一区。己巳冬，奉命得归田里，投老于兹，喜其地僻事简，无外物之扰，得以优游林野，适其翫游之乐。

文中所提到的陆编修雅坪即官至礼部侍郎的平湖籍学者陆棻。

定居平湖后，高氏一家住在城中，宅中有瓶庐、信天巢、嗅香斋、朗润堂等建筑，屡屡见于高士奇题跋中；同时，高士奇在城北十余里地也购置一处苑囿，原为冯

氏旧宅，他购买后进行一番整修，命名“北墅”。高士奇自此开始理想中的伏日闲居的归隐生活，将所有的精力放在书画鉴定上，日日展卷题跋，至康熙三十二年(1693)高士奇重新进京。在这3年时间里，他完成了《江村消夏录》一书。翌年，该书由高氏朗润堂刊印。

“江村”为高士奇的别业“北墅”内的一组建筑群名(全名为“江村草堂”)，同时这一别号也寄托了他对祖籍余姚的怀念之情；因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(1693)六月夏季，故曰“消夏”。全书分为三卷，前有朱彝尊、宋荦序和自序。全书共收录书画作品210件，其中书法作品41件、绘画作品169件。从高氏自序中看出，收录作品“宁慎勿滥”，因此数量不算太大。作品时代基本始于唐，终于明中叶吴门四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书中收录的这些作品并非全数为高氏藏品，包含其寓目之作，高士奇在自序中提到：“其所录者，皆余亲经品第，足资鉴藏者也。”但高士奇在书中未对寓目作品的收藏者加以说明。

在《江村消夏录》中，虽然所录主流是文人墨戏画风作品，但不难发现依旧有许多非文人画作品。高士奇运用自己擅长的考证法对自己的藏品进行一一梳理，关注藏品的艺术水准、意境效果，也让自己的鉴定透着历史学意味。当然，对董其昌理论的继承依旧是其鉴藏思想的主导，还单独列出董其昌作品进行著录，确为鉴藏界一创举。

成书后，朱彝尊为《江村消夏录》作序，序中写道——

广川董氏病其冗长，其余又嫌太略。《宣和画谱》仅谱其人及所藏之目，南渡馆阁之



高士奇的《江村消夏录》

储，于金铜玉石悉识其尺寸，而于书画无之。盖昔人心思或有未及，必俟后贤而始大备也。钱塘高唐事退居柘湖，撰《江村消夏录》，于古人书画真迹，为卷为轴，为笺为绢，必谨识尺度、广狭、断续及印记多寡，跋尾之先后，而间以己意折衷甄综之，评书画者至此大备焉。

可见，朱彝尊已经敏锐地察觉到《江村消夏录》的最大价值在于体例的完备与精详。

由此，中国古代书画著录经过千年的发展历程，至高士奇此书才形成比较稳定的登录体例：作品名称、作者、尺寸、内容、技法类型、作者款式印章、他人题跋、收藏印章等。

比较创新的一点还在于高士奇将书画上的印章都依其原型描摹，内书楷书释文。这样一来，使得书画著录与藏品管理逐步规范化，成为后来著录者们操作性极强的范本。此书经高士奇朗润堂自行刊刻后，晚清、民国屡有影印，亦有抄本流传。

在《江村消夏录》之后刊行的书画著录书，在体例上都带有模仿前者的痕迹，如乾隆年间编纂的两部内府著录书《石渠宝笈》《秘殿珠林》，唯印章记释文而不摹其印形。由于官方内府著录的采用，使得《江村消夏录》的影响更加深远，被后来的私家著录者反复摹仿，如陆时化《吴越所见书画录》、吴荣光《辛丑销夏记》等。

# 平湖的清客班与奏班

■ 邓中肯

在撰写《钱南扬传》和整理《钱南扬年表》时，我特别关注钱南扬先生在平湖参与有关昆曲活动的细节。早在省立二中求学时，因受国文教师刘子庚先生的影响，钱南扬便“每逢寒暑假回家，便参加家乡的曲会，学唱昆曲”(钱南扬《钱南扬自传》)。钱南扬开始学习昆曲是在1915年，那时平湖昆曲社团林立，演唱人员众多，交流活动频繁。一等放假回乡，钱南扬便沉湎其中，还有几次有幸观摩到了在城隍庙、葛氏传朴堂、莫氏春晖堂举行的堂会曲叙，受益匪浅，进步飞快。

平湖历史上属古海盐县的一部分，盛行海盐腔，脱胎于海盐腔的昆曲在平湖城乡非常令人青睐。清末及民国时期，城关的晨曦社、三聚堂等颇有名声，张传琨、葛继乔、莫孟弢以及程步高等人非常活跃；新仓、广陈、乍浦、钟埭、新埭等乡镇的清客班多达几十班，奏班更是比比皆是。

平湖的清客班、奏班最早始于嘉庆年间，历经晚清与民国时期，最后大多散于1949年。

清客班，又称“丝竹”“清音班”，就是专门清唱昆曲的班社。清客班均自发组织，自己寻师学艺、购买乐器，农闲或晚上围坐一起，吹吹唱唱，也算是一种享受，来看热闹的络绎不绝。每逢婚嫁寿庆，清客班也会应邀助兴，但大多不收报酬。平湖的清客班主要分布在新仓、广陈一带，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有“合记清音社”，贾家浜(今新仓镇中华村)沈简甫于民国二十三年(1934)创建。新仓一带还有张金龙、高家村(大进村)、张家宅基(大利村)、中华、联丰等清客班；广陈一带有“豆腐厢院”(泗泾村)等清客班。采自新仓高家村的曲目《倒垂帘》1957年参加了浙江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，曲目《拍场》长达320节，在民间器乐曲中较为罕见。这两曲均被编入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(浙江卷)》。

平湖最有名的清客班是晨曦社，为一昆曲业余组织，其前身是清代光绪末年(约1908)由张传琨、汪容第、叶叶厚三人发起成

立的“民智俱乐部”，社址在城隍庙旁边。这是迄今为止可考证的平湖最早的剧团。辛亥革命(1911)后“民智俱乐部”改名为“晨曦社”，主要成员有陈不凡、徐嘉麟、葛继乔、莫孟弢、陈斐臣以及稍后的程步高、叶荣高、叶运升、陈景常等。该社以唱昆曲为主，有时也唱文明戏和苏滩。该社的发起人之一张传琨(1887—1961)，字卓身，号子石，笔名葡萄仙子，秀才，清末公费留学日本，入东京高等学校学习，与苏曼殊同宿舍。师从章太炎，与李叔同、柳亚子等交往甚密。在日本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，后投师霍元甲，研习武功。辛亥革命时在上海随黄兴、宋教仁、陈英士等组织武装起义，参与攻打上海铸造局。与夫人范慕蓁(嘉兴范古农之妹)同入南社。1921年创办《民声报》，任主编，该报是平湖早期较有影响的报纸。后息影平湖，租借城西南边的陶氏花园——陶园居住，常饮酒赋诗，组织曲友唱曲。

1920年，曲友葛继乔、莫孟弢等人到乍浦蒲阳会馆彩串，演出《琴挑》等剧目。据曲友陈景常《两湖弦管忆盛会》记载，平湖的曲友曾有过两次盛大的曲叙。一次是1931年中秋节，在鸚鵡湖(即东湖)举行了赏月清唱晚会，下午三点钟在湖墩的远山初月轩集合上船，到小湖墩停泊，轮流唱曲，六点钟停锣，在船上吃晚饭，用餐后继续开锣，晚上一律唱折子戏，连唱带白。其时皓月从湖面升起，冰轮乍转，直唱到深夜才歇。另一次是在1932年七夕，平湖与嘉兴的曲友在南湖烟雨楼举行联欢，人数更多，水平更高。

能唱昆曲的班社还有奏班。奏班，是平湖、海盐、嘉兴和宁波一带民间半业余职业的昆曲班社，为昆曲清唱并有伴奏的乐班，又称“奏台”“坐唱班”，大多在庙会、行业会馆的节假日以及民间婚寿喜庆时设台奏唱。每班人员，分角色，配锣鼓，有乐器，一边吹奏，一边唱曲，称为“昆奏”。所设台面也有讲究，一般用两张八仙桌拼成，称为“平台奏”，如用专门精工搭制的台面，则称为“洋台奏”，如果因陋就简如同草台班，便称为“草笛奏”或“羊笛奏”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渐趋衰亡。

平湖奏班的名称一般都称“堂”(个别称“奏”)，因此而指称“堂名”。民国时期平湖有不少奏班，但因久已消散，堂名湮没。现据调查和考证确凿的有十二个——

三聚堂(凌云奏)，平湖的昆曲堂名奏班。嘉庆时由盛少莲的祖父开办奏班唱曲，为世业，同治年间盛少莲为班主，定名为“三聚堂”。后由盛少莲传其子盛寿昌、盛桂昌、盛鼎昌、盛同昌。民国年间，传到盛寿昌之子盛华堂手里，改名为“大同堂”，有洋台九副。再由盛华堂传子盛定良(大阿官)、盛定玉(小阿官)，至1948年歇伙停班。

怡庆奏，乍浦镇徐姓三乐堂的昆曲奏班。光绪年间由方鸿宝创办，传子方余庆、方世庆和门徒庆和，后由其孙方照宝接办，至日寇入侵乍浦沦陷时停业。

二雅堂，新埭镇的昆曲奏班。光绪年间由沈青斋、沈旭初创办，分组两班。1949年歇伙。

紫霄堂，新仓镇三叉河的昆曲奏班。光绪年间由邓艺仙创办，后由其子邓秋波接办，有洋台一副，经营到1959年为止。

遏云奏，乍浦镇汪姓润德堂的昆曲奏班。民国初年组建，班主陆排(原系怡庆奏的管箱)，传子陆炳荣、陆陆付庆，至日寇入侵乍浦沦陷时停业。

青乐堂，乍浦镇的昆曲奏班。班主林三观，1928年创建，传子林老虎，再传孙林永明，1949年歇伙。

三乐堂，班主盛鹤如，1930年在县城组班。

双凤堂，班主沈宗轩，后由杨少华接管，抗战前在新仓镇组班。

信义堂，班主钟善麟，1940年在县城组班。

鸣声社，班主程士康，1940年在城隍庙组班。

和合堂，班主张文生，1940年前后在钟埭乡组班，抗战后歇伙。

同乐堂，班主沈鸿声，1945年在广陈乡组班，1949年歇伙。

但是，农村奏班大多无堂名，常以班主姓名或绰号称呼。新仓一带还有东马桥蒋姓奏班(创建于1880年)、共联徐家、联群沈家、三叉河吴家等奏班；乍浦一带还有王文彬、陈和尚、杨老虎、刘云各等奏班；广陈一带还有桑园里等奏班，黄姑一带还有戴玉观等奏班；全塘一带还有张玉和、张友奎(盲子)等奏班；钟埭一带还有谢四佬等奏班；曹桥一带有陶家班(至今相传14代，有200多年历史)、黄庭菜、马许三等奏班；林埭一带有顾炳金等奏班；当湖一带有毛祖良等奏班。

平湖的奏班主要分布在乡村(城区也有，但较少)，是半业余半职业的性质，从业者平时分散在家种田或做工，业余练习；一旦受雇，便集合应召，演奏献艺，获取相当的报酬。还有一种奇特现象，那就是道观里的道士大多能吹唱昆曲，所以有一些道士也参加到奏班或清客班的队伍中来。

奏班一般由六人或八人组成，伴奏乐器有鼓、板、笛、大锣、小锣(佳皮)、二胡、琵琶、唢呐、四尺、木鱼等。一般以两张方桌连缀成台，台前有锦绣桌围，绣上奏班名称。两侧各坐三人或四人，乐队每人各兼歌者，生旦净末丑的曲子都能演唱。桌椅的外围临

时搭起框架(乐舆)，雕花金漆，十分美观，四周上端悬挂彩灯，框架可以拆卸、组合，拆散后装在箱内，方便肩挑，故称“堂名担”。婚寿喜庆过程中，上午敲头场，午饭后闹场，奏班人员人人能吹拉弹唱，随雇主点谱，晚上还可“摊黄”(类似于独角戏，但两两竞比)，有时直至天亮。

奏班的经济收入来源于东家的酬谢红包，多少不定。昔日奏班里流传一句俗语，叫做“七死八活，九金十银，三春一冬”，意思是指农历七月初基本无生意，八月开始了生意，九、十月生意最兴隆，一年的生意全靠九、十月以及冬季的三个月。

奏班演奏的婚寿喜庆曲调主要有《轿前红》《六部圆》《六工尺一》等，常唱的有分属于《牡丹亭》《长生殿》《琵琶记》《白蛇传》《拜月亭》《水滸记》《西游记》等传统戏中的折子戏一百余齣，常唱的昆曲折子戏有《四郎探母》《刘备招亲》《玉堂春》《追韩信》《甘露寺》以及《占花魁·劝妆、湖楼、受吐、独占》、《牡丹亭·劝农、学堂、游园、惊梦、冥判、拾画、叫画、回路》《长生殿·定情、赐盒、疑谶、惊变、埋玉、闻铃》《孽海记·思凡、下山》《西游记·认子、北钱、借扇》等，还有平湖人沈鲸创作的作品。

明代戏曲作家沈鲸，字涂川，号涅川，生卒年不详，主要生活在嘉靖至万历年间，曾做过嘉兴府知事。他所作传奇昆剧剧本今知有四部——

《蛟绡记》，演魏必简与沈琼英遇合事，以蛟绡为聘礼，故名。《缀白裘》收录《草帽》《写状》《狱别》《监绑》四出，今尚有演出者。有清顺治沈仁甫抄本传世，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》据以影印。

《易鞋记》，演程鹏举与妻白玉娘易鞋为别，始离终合事。有明文林阁本传世，《古本戏曲丛刊初本》据以影印。

《青楼记》全文已佚，仅《怡春锦》选有《赠香》一出。

《双珠记》共有四十六折，昆曲演出有《二探》《卖子》《投渊》《天打》《中军》等几折，经奏班演艺保存了《卖子》《投渊》两折。曲坛历来对《双珠记》评价甚高，梁廷栋《曲话》卷三：“《双珠记》通部细针密线，其穿穴照应处，如天衣无缝，具见巧思。”吕天成《曲品》称赞此剧“情节极苦，串合最巧，观之惨然”。日本青木正儿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说：“此记前半，明清戏曲悲剧中，为稀见之佳构。”《古本戏曲丛刊》(初集)收有据明末汲古阁原刊本影印，另有清康熙盛端阳钞本、梅兰芳所藏清抄本以及《六十种曲》本。

传奇昆剧剧本《双珠记》，取材于元代陶宗仪的《辍耕录·贞烈墓》，人物姓名及情节已有改动。该剧以双珠的分合得失为线索，描写了王楫全家悲欢离合的故事。其主要情节是，王楫代替伯父滴戍，娶妻子至邵阳投军。离家时，母以家传双珠中一颗给他留作纪念。至戍所后，营长李克成谋占王楫之妻郭氏，陷害王楫入狱。郭氏暗将明珠系于其子九龄颈上，卖与陕西客商，然后投渊自杀，神灵护之使不死。郭氏上京鸣冤，遇王母母避乱上京，同寄寓于母姊韩氏亲戚家。适朝中大臣袁天纲被征召进京路过，郭氏托袁救夫。袁天纲乃谏天子，大赦天下，王楫免死，改谪剑南。王楫友陈时策时为边将，劝王楫从军，共立边功。王楫妹慧姬入宫为宫女，因在寒衣上题诗，为陈时策所得，天子

赐两人结婚。慧姬赴剑南途中，将双珠中另一颗遗失，被人拾到去韩媪家易酒。王楫子九龄已长大成人，应科举中状元，千里寻亲，珠联人合，全家团圆。

沈鲸作品，长于炼境，而其语言艺术十分精湛。今录其《卖子》一折中的一小段唱词，足以显现他的灿然文采——

【前腔】风尘奔走，栖栖丧家狗。誓死明初志，抱子先求售。我那儿呵，今日娘怀，明朝在谁手？此际情何限，天地同高厚。说到堪伤泪自流，沈痛黄泉兀未休。

沈鲸口耳相传的一大俗语“靠山吃山”，最早就是见于这部《双珠记》。清代还有平湖乍浦人沈筠的剧本《千金寿》二卷存世，有道光十四年(1834)守经堂刊本，许河题词，全剧十六出，首尾各增一出。《千金寿》是沈筠根据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而改编的昆剧，表现战国时鲁仲连为赵国解除秦兵之围，平原君以千金为鲁仲连祝寿之事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1950年以后至六十年代初，平湖乡村中还有奏班活动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全部消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在平湖的新仓、广陈、曹桥、共建等乡，曾有少数老艺人自由组合，恢复传统的奏唱昆曲活动。

清客班和奏班继承了昆曲在民间的传唱，成为昆曲艺术存活的湿地，因而一度使走向式微的昆曲艺术得以保鲜。钱南扬先生16岁起在平湖学习昆曲，此后不仅会唱曲、度曲，还能登台演出，反串旦角，最重要的是成为戏曲理论研究的一代宗师。他还活跃于戏曲会唱活动上，经常参加杭州昆曲社团的“雪社”活动；1946年秋，钱南扬加入了杭州成立的昆曲业余组织“梅社”。1947年2月，“西湖曲社”在湖滨的西湖饭店举行了昆曲会，这是战后的第一次雅集，钱南扬演唱了《西楼记·楼会》一齣。所以说，平湖能出钱南扬这样的戏曲大家，跟平湖普遍而又活跃的昆曲演唱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清客班和奏班对昆曲在民间的普及推广起过重大的作用，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唱曲拍曲和乐队伴奏的人才。平湖派琵琶艺术第六代传人朱英先生为琵琶高手，人人都知晓。但他擅长昆曲，更有深厚修养，则鲜为人知。梅兰芳于《舞台经验四十年》一文中，谈到昆曲，曾“向平湖朱英请教”。在“平湖县中”一次文艺晚会上，他曾有兴演唱昆曲，珠圆玉润，不同凡响！

清客班和奏班的文艺款式对今天文艺复兴、文化建设和创新发展群众文化仍有很大启示、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。2004年，广陈镇泗泾村民乐队在原“豆腐厢院”清客班的基础上重新组建，经常活动，具有较大影响。2009年“浙江在线”报道了泗泾村清客班的“复活”，频频亮相于各种文艺活动及比赛，至今仍活跃于各种文艺舞台上，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。广陈现有“鸣乐堂”奏班，成员有金其华、吕家原、陈跃良三人，时有被邀请去演唱。从2019年11月开始，设在钱南扬纪念馆内的“汉上”周末戏苑于每周六下午2点准时开演，当湖街道戏曲团队风雨无阻都会在这里呈现精彩的戏曲演出。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0场演出，吸引了两千多名戏曲爱好者前来观看。这是广大戏曲爱好者学习、交流和展示的一个绝好平台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绽放出璀璨的光芒。



奏班